“塞外小岗”

——内蒙古达拉特旗、托克托县农村改革记事

经济日报·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力

改革开放40年

编者按 滔滔黄河一路向东，经历百转千回，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、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后，掉头南下，勾勒出一个大大的“几”字湾。1978年,位于黄河南岸的达拉特旗耳字壕公社康家湾大队，一位叫赵丑女的农村妇女大胆承包了村里的14亩土地；1978年和1979年冬春之交，黄河北岸的托克托县中滩公社，则给社员每人划分了2亩“口粮田”。

1978年，安徽小岗村“大包干”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“东风第一枝”。而在几千里外，后来被称为“塞外小岗”的耳字壕、中滩的农牧民们，同样在惴惴不安中跃跃欲试。“咔吧吧”，黄河冰裂了；“呼隆隆”，黄河流凌了。不仅耳字壕、中滩，呼和浩特、伊克昭盟（鄂尔多斯市的前身），乃至整个内蒙古也随之开启了一次历史性的大河破冰。

2018年早春，古老的敕勒川上，“绿柳才黄半未匀”。刚刚播种的田野，还是黑黄的一片。惟有托克托县树尔营村水稻育秧大棚里，嫩油油的满目新翠，叫人眼前一亮。

当年的托克托县中滩公社，变为中滩乡后又划入双河镇，如今再划归河口管委会管辖。“当年中滩包产到户时我只有14岁。”抚今追昔，河口管委会树尔营村农民李广应无限感慨，“当时的记忆就是吃不饱，如今我们这里成了‘塞外江南’，真像做梦一样”。

当年率先分田到户，如今树尔营村又率先把全村的土地集中流转到“美源农业合作社”。像李广应这样的村民，每年除稳定获取一块土地流转费用外，还能在合作社里打工获取“工资性收入”。过去就是种玉米、小麦、杂粮，如今合作社把沿黄盐碱地改造成一平如镜的稻田，稻田里还养上了螃蟹。以前沿黄小水泊只是用来灌溉，如今合作社也全部流转过来，水面养鸭，水下养鱼。“树尔营村不仅成了鱼米之乡，也成了富裕之乡。”李广应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，“以种玉米为例，过去一亩地的纯收入也就400多元钱。去年我们把盐碱地改造成稻田，全村的土地由1200亩增加到2000多亩，种了600亩水稻，平均亩产600多斤。按六成的出米率计算，可产大米360多斤。每斤大米10元钱，毛收入就是3600多元。扣去成本，一亩地的纯收入有2000多元。”

……

“塞外小岗”与安徽小岗一样，是中国农村改革40年的一个缩影。而当人们对眼前的变化习以为常时，我们有必要把时间的指针拨向历史的起点，去追寻改革的初心。

从“口粮田”到“大包干”

——对内蒙古农村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的调查

图① 经过达拉特旗农牧民几十年的艰苦改造,这里已成为一片丰饶的沃土。 贺 圆摄

图②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耳字壕村“大包干”先行者赵丑女。 (资料图片)

图③ 1980年12月1日,《人民日报》对内蒙古农村“大包干”所做的报道。 (资料图片)

两次不同命运的探索

81岁的马义山身板硬朗，别看老人在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刘存圪旦村务农一辈子，但对几十年来农村的改革发展却梳理得清清楚楚，说得头头是道。“经过几次撤乡并镇，耳字壕也划归树林召镇了。但耳字壕搞大包干没有咱刘存圪旦生产队早，安徽小岗村也没有刘存圪旦早!”

马义山讲述了一桩往事。早在1973年，达拉特旗树林召公社白柜大队刘存圪旦生产队就曾大胆搞过一次“包产到组”。那年，刘存圪旦全队共有47户、186口人，80个男女劳动力，全部家当有耕地500亩、机井4眼、胶车3辆、牛犁5架、百八十只羊、一个半砖窑，再加上一些基本农机具。该生产队地处黄河岸边，是典型的“白碱滩”，从远处望去，白茫茫一片，耕作一年，连籽种也收不回来。群众有段顺口溜：“蚊子咬，蛤蟆叫，天阴下雨走不了。”当时社员吃的是返销粮，4斤马铃薯顶一斤粮食，困难年景就拿高粱面当主食，腌甜菜叶子当副食，但还是吃不饱。

1973年春，公社召开“三干会”，会上给生产队下达了84000斤的粮食任务。要是按老办法，正常的年景也很难完成任务。生产队长马三满银参加了会议，开完会，马三满银回到家对儿子说：“今年我想搞个分组，这样社员的责任心增强，相互竞争，肯定能比现在产粮多些。”听了父亲的想法，儿子提醒道：“那可是犯法的事情呀！”马队长不为所动，“老话说，民以食为天，吃饱肚皮是关键”。于是，刘存圪旦实行了“包产到组”，划小了核算单位，社员们“利益关切度”明显提高，一改过去“打盹熬满天，阳婆(太阳)落了算一天”的状态。一年干下来，粮食产量创造了奇迹，达到113000斤，比计划增产29000斤。除每人分口粮380斤外，还向国家上交粮食5000斤。

刘存圪旦粮食丰收轰动了整个达拉特旗，不仅当选公社的先进，还获得了旗里的表彰。就在马三满银和社员们满心欢喜时，却被盟里兜头泼了一盆冷水——路线错误：“路线要对，一粒粮食打不下也不怕；路线不对，打下一堆粮食也不行”。刘存圪旦非但不能作为先进典型，还要当作反面教材。年底，盟、旗、公社三级组成调查组，对刘存圪旦“包产到组”彻底叫停，马三满银也被免去了生产队队长职务。

从马义山充满感情的回忆中,我们感到了农村改革探索之艰辛，也听到了民心深处穷则思变的律动，看到了打破死水的那第一轮涟漪……

几年后，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赵丑女做出了同样的举动，但她的命运却截然不同。

“这是孩子们在报纸上找到的母亲的相片，用手机翻拍下来发给我的。”陈绿师说，“母亲一生勤劳，省吃俭用，没照过几次相。这张照片还是她参加劳模大会时记者拍下的，我一直都带在身上”。说起自己的母亲——鄂尔多斯农村改革的先行者赵丑女，陈绿师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。

“我们康家湾大队居住分散，当年母亲到队里上工要走很远的一段山路。母亲看不惯大集体时社员出工不出力，自己多劳又不多得，就提出自己来承包家门口的14亩地。”陈绿师说，那时候，山梁上的康家湾虽然封闭，但刘存圪旦生产队搞承包挨处分的事，仍然对康家湾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但赵丑女不信邪。她在14亩承包地上打了深井，上了水车，起早贪黑侍弄庄稼。赵丑女承包的这14亩地共分6块，都是山坡漏沙地，粮食单产只有200斤。但赵丑女包种3年，每年平均亩产在500斤以上。3年下来，这位50多岁的农家妇女，一个人在14亩地上产出的粮食，几乎占了康家湾大队50多个壮劳力在80亩土地上产粮的一半。

当年的伊克昭盟报文章《赵丑女靠精耕细作致富》这样记载：“赵丑女在漏沙坡耕地上夺高产，原因主要有两条：一是开展水土保持和改良土壤，改变生产条件。她通过辛勤的劳动，把斜坡地修成小型水平梯田，打起了地边埂，用石头垒起了堰子，这就真正把‘三跑田’变成了‘三保田’。她认真改良土地，把鸡蛋大的石块全部拣出去，将草根和作物茬子刨出去，然后铺上黏土，使这十四亩漏沙地变成了基本田。二是精耕细作。种植玉米时，她一窝一窝地点种，种下去土地稍有板结，随时用小锄松土，以防顶芽造成缺苗断垅。第一次锄田，全用小锄一苗苗地细锄，基本上做到了单株管理。所有作物都锄三次以上，追化肥两次。为了多打粮食，多得到经济收入，赵丑女把整天工夫全下到土地上了，对株株庄稼苗她都精心管理，一直到秋收。秋收以后她又下苦功夫搞农田基本建设，为来年生产打基础。由此可见，瘦土薄田年年夺高产，完全是她用汗水浇灌出来的……”

耳字壕公社康家湾大队又一次轰动了整个达拉特旗。与刘存圪旦不同的是，刚刚走马上任的伊克昭盟盟委书记千奋勇来到耳字壕，不仅对赵丑女赞不绝口，鼓励她继续承包，还把这个典型推荐给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千奋勇与伊盟农村改革》一书专门记录了这个细节：周惠书记特意把一封信带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，这封信的标题是《像赵丑女这样的包产到户何罪之有?》。

“不怕丢掉乌纱帽，怎样增产怎样搞”，后来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、自治区政协主席的千奋勇的这句话至今流传。鄂尔多斯市委政研室原主任王进勇介绍，千奋勇在当时的伊克昭盟工作期间，几乎走遍了每个旗县的公社。除了树立达拉特旗赵丑女这个典型，还推广了杭锦旗巴拉亥公社的经验，从1979年春季开始，这个公社的新明大队率先搞了“包产到户”责任制，粮食比上一年增产43%。盟委在1979年8月，用十几天的时间组织全盟农业社党委书记从杭锦旗到达拉特旗“拉练”观摩。千奋勇还亲自撰写了《包产到户是伊克昭盟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坦途》，发表在报纸上。即使如此，在当时的伊克昭盟，“大、公、平、穷”等“左”的思想还有市场，围绕“包产到户”发生的争论经历了将近两年时间。遇到顽固势力层层阻挠，千奋勇就鼓励新生力量节节进击。春风一过万重绿。到1980年底，全盟73%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。

后来，有中央领导同志曾对周惠说过，包产到户是安徽、四川和你们内蒙古先干起来的。周惠又对千奋勇说过，内蒙古的包产到户是呼和浩特和你们伊克昭盟先干起来的。

记者旁白：凡人之情，穷则思变。从安徽小岗到“塞外小岗”，地隔千里，资讯不通，却殊途同归地干起了“大包干”，充分证明了“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，是真正的英雄”。而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，把人民拥护不拥护、赞成不赞成、高兴不高兴、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，正是那些勇于改革担当的党员领导干部被人民群众铭记的根本原因。

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

再把镜头移回黄河北岸的托克托县。在这里,大黑河、宝贝河等支流“万水入黄”,令磅礴的黄河南下,直接劈开了晋陕大峡谷。中滩公社就在黄河和大黑河的冲积扇内,天赐灌溉与舟楫之利,可很长一段时间,这里的群众就是填不饱肚子。“高级社时大跑步,公社化时一刀切,大跃进时一平二调,‘文化大革命’时‘割资本主义的尾巴’……不把精力放在生产上,老百姓能不穷吗?”当年的中滩公社下滩村会计王兵厚说。

资料显示，1976年至1978年，中滩公社的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500万斤左右，亩产只有100斤，连续3年没有给国家上交粮食，反而年年吃返销粮。当时，农民一年劳作下来，人均年收入只有30元。其中，河上营大队的几个生产队，不仅分不到钱，还出现了倒挂：谁挣的工分多，谁欠的钱就多。那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：早上铜铃铃(高粱面窝窝头)，午饭黄绳绳（用玉米面制作的钢丝面），晚上碗底照清清（比喻一眼见底的稀饭）。

农民出身的中滩公社党委书记马从发知道，大集体时社员“自留地里打冲锋，集体田里养精神”，导致了“人哄地皮、地哄肚皮”。1979年春节前夕，马从发找到了县委书记贾根宝慷慨陈情：“连续3年靠返销，中滩百姓已经吃不饱肚子了，是我这个书记没当好。再不变调（当地土语，意为改革)，我这个书记就干不下去了。”从县委书记默许的眼神中得到鼓励，马从发立即找到公社革委会主任菅光耀，“我想把一部分土地分给社员，你愿不愿和我一起冒个险?”菅光耀表示有难同当，豁出来试一试，但没想到召开三级干部会时，会场炸了锅。有的坚决反对，有的心有顾虑。马从发发火了：“解放这么多年，农民还啼饥号寒，我看该是我们一级党委承担责任的时候了！农时不等人，有不同意见的可以保留意见，也可以不来工作，就是不能和公社党委唱对台戏!”

如果说，小岗村的大包干是自下而上、农民承担风险，中滩公社则是自上而下、党组织挺身担责。

1979年春节刚过，马从发和菅光耀在下滩大队带领群众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，给每位农民分了二亩半“口粮田”，在内蒙古地区率先实行了“口粮田+商品粮田”责任制。结果令人欣喜，改革当年，中滩就结束了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，摘掉了全县倒数第一的帽子，还上交了16万斤公粮，成功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。

1980年，在总结“两田”分离经验的基础上，中滩公社又大胆提出了“包干到户”的设想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当年，中滩公社70个实行“大包干”的生产队，大旱之年仍获丰收，不但解决了社员的口粮和牲口饲料、来年籽种问题，还向国家净交商品粮36万公斤，比上年增加3倍多。这一事件被新华社《内参》披露后，中央领导批示：“这是群众自发的‘治穷改富’的有效探索。”这一年，全县出现了分组作业、包产到组、定额管理和“口粮田”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。对此，1980年12月1日《人民日报》以《从“口粮田”到“大包干”》为题进行了报道。

10年前，有记者回访中滩，却发现“老典型”落后了：黄河堤坝上泥泞的通村小路，村里的房屋多数破旧老化，虽是收获季节却难见青壮年……这一景象，很难与当年辉煌一时的“塞上小岗”联系在一起。

“幸亏没有下雨，不然这条从县城通村的路开车根本进不来”，下滩村党支部书记池秉义充满无奈，“下滩村与以前比确实进步很大，但与周围的一些村社相比落后了。究其原因，是下滩村产业结构调整没有大动作，绝大多数村民观念还没有离开‘种地’。集体经济空壳化，道路年久失修，很多村民的致富脱贫梦想因路而中断”。

与下滩村相邻的河口村却是另一番景象。这个村在之前实行“大包干”时，主要的村集体经济也得以保留，并不断培育壮大。曾在1976年至1992年期间担任河口村党支部书记的徐玉河老人回忆说，当时搞“大包干”时，土地、牲畜、农具都分给社员，但有2辆拖拉机、2辆铲车以及一些水利设施没有分。上世纪80年代，河口村在原有的集体经济基础上补充了一批货车、客车，组建运输队为村里创收，一年收入10多万元。1994年，村集体继续调整结构，“淘汰”了竞争激烈的运输业办起了砖厂，砖厂的资产总额达到135万元，让60多名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。2007年，河口村又依托地处黄河北岸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，开办旅游餐饮业。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，河口村村民的自来水、农灌用水、基本医疗保险、兴办公益事业经费等由村委会统一支付，生活用电每人每年由村委会补贴，村民基本实现了“零社会负担”，这个村也被评为全国500强村镇。

今年，记者再访中滩，又见到了当年改革的参与者、下滩大队原党支部副支书陶如新。这位年过八旬的老者并不止于怀旧。他说，农村改革就该像黄河的波浪，必须一浪接一浪，否则就算解决了温饱，也实现不了富裕。

记者旁白：改革开放40年来，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，无数农民也大踏步跟上了时代。这一切，来源于通过改革主动适应自然规律、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深刻认知。但改革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倘若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，久则满，满则怠，怠则滞。“改革就该像黄河的波浪，必须一浪接一浪”，这话是老百姓总结出来的，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。

（下转第十四版）